



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

周亨祥◎著

中华民族军事思想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意义，研究中华民族军事思想发展的轨迹，有利于我们吸取先哲的大智慧，继往开来，从容应对现代形势下的国际斗争。



海天出版社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中国 古代军事 思想发展史

周亨祥◎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 / 周亨祥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507-0619-4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军事思想史—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E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7645号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

ZHONGGUO GUDAI JUNSHI SIXIANG FAZHAN SHI

出品人 尹昌龙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杨月进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线艺设计
电话 83460339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60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5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绪论

战争是什么？是恶魔，是幽灵，似乎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可这个恶魔，这个幽灵，却硬是纠缠着人类，挥之不去，摆脱不了。

战争是什么？是利剑，是火炬！是“贵族”拔出的利剑，是“奴隶”和“正义”点燃的火炬！利剑，芟夷了荆棘，荼毒了生灵！火炬，照亮了黑夜，焚毁了腐朽！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有时，剑与剑对刺，但多是剑与火的较量。旧的利剑销毁后，新的利剑又铸成。历史，就是这样地在血与火中艰难地前行。只有当全球的火炬销熔了利剑，并最终焚毁了“贵族”与“奴隶”的阶梯，没有铸剑的必要时，战争才能最后退出历史的舞台。

战争，这个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阶级的政治集团的意志的体现，即使民族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的政治集团的战争。它是阶级的、政治集团的、民族的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状态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阶级的、国家的、民族的意志，都是通过一定的政治集团来体现，来代表的。

战争并非同人类与生俱来，它是在私有制产生以后，阶级出现以后，一方以武力迫使对方屈从自己的意志，并建立保持这种政治格局的统治机构——“国家”时，才产生的。所以，战争是“国家”的缔造者，战争是将人类送入阶级社会的推进器。它在“缔造”国家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进化”。我们认为，凡原始氏族社会的族群之间的各种争斗都不能称之为“战争”，只能称之为争夺生存资源、融化氏族的争斗，只有这种争斗以阶级压迫为目的，以政治斗争为性质而出现时，“战争”才算诞生。此前的一切争、斗、战，都处于“战争”的孕育期。“胎儿”是只有产出母体才能称为“婴儿”的。有人在古书上一见到“战”便认定为“战争”，这是不可取的。直至漫长的地主阶级封建社会，宗族群体之间的械斗还时有发生，现代社会依然有非政治目的的绑架、暗杀活动（有政治目的的就是战争），我们能称之为“战争”吗？这便是原始氏族社会之“战”在后代的活化石。

当然，王权一旦建立，战争一旦产生，王权周围的氏族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得被拉进战争的泥潭，这是不以其发展程度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战争产生，国家政权建立后，组建常备军，制造兵器，巩固和保卫“国家”政权，准备和发动战争等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便产生了。军队——这个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军事成为国家、政治集团政治事务中的首要事务。在社会生活领域，只有军事是直接为政治、政权服务的，而且是唯一只为政

治、政权服务的。^①从此，哪一个国家政权或政治集团都把军事放在首位，谁要想夺取政权或保卫、巩固政权，谁就必须关注军事、抓紧军事活动。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如果控制不住军权，那么，他就会失去政权，军事政变往往因此产生；一个国家政权腐败或散乱，主政者控制不了军权，就会天下大乱，出现军事割据或军阀混战，如春秋战国、东汉末、唐末、清末民初，都出现大规模的军事混战。只有新的政治集团和他的军事力量平息了混战，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新的政权，社会才趋于新的安定。

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特殊手段；军队，是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被一定的政治集团所组建、所运用的。一切军事都是政治，它存在于政治之中，不是平行或独立于政治之外。我们平常将政治、军事相提并论，是因为军事、战争、作战方式与国家行政官吏、行政管理、管理方式有别。然而，这两者都是受政治集团及其政治思想统一支配，是相互有机联系着的，都是为特定的政权（政治集团）所有，为特定的政权（政治集团）服务的。世界上，只有未掌握武装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没有脱离政治的“军事”斗争，没有政治目的的军事是不存在的。

军事、军队，是一定政治集团为了解决政权问题所使用的最高手段和工具；军事思想是一定阶级、一定政治集团（一定的政治集团都是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代表）首要的、根本的政治思想。最根本的政治思想，为着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根本政治思想，就是军事思想，就是军事战略思想；最高的军事思想，最大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最根本的政治思想。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一切围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形成的决策、思想，都是军事思想。

军事、战争，所解决的都是政治、政权的核心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思想是政治谋略思想最根本的部分。军事战略思想是为达成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有机的部署方略，它应该而且必须着眼于政治，在政治的视野下，做全方位的努力，来解决军事目标问题，达成政治目的。军事思想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战争和军队的内容，而是包括为有效地夺取和巩固政权所必要进行的政治、外交、经济、宣传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军事家很早就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尉缭子·兵令》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他看到了“武”是现象，“文”是本质。早于尉缭子的伟大军事思想家孙子对军事谋略的最高境界论述得充分透彻，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通过诉诸兵刃就取得战争胜利，是最高明的军事家、政治家，这种战略指导思想是最高明的战略指导思想。“上战无与战”^②，最高明的用兵谋略就是不通过诉诸兵刃便取得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孙武把战略指导思想的高下分了四个层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最高层次是伐谋，这里的“谋”当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谋略”，因为无论伐交、伐兵、攻城，都要普通意义上的谋

① 其他领域则主要是为社会生存、发展、公共管理服务，虽然它们受政治、政权的一定程度的制约。

② 《六韬》。

略；这里的谋，是指在政治视野下全方位的筹谋，是最高、最全面的谋略层次，他包括了伐交、伐兵、攻城，但比它们的总和还多，还包括例如间谍呀，经济呀等等。伐兵、攻城，在伐谋开始阶段就表现为积极的军事准备和军事威慑。如果无须把战争威慑变为战争行动，无须动用兵刃，战争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军事思想（主要是战略思想）所涉及的并不都是战争的军队的行动，还包括与夺取和巩固政权密切相关的、必要的，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宣传、间谍情报等各种活动。换句话说，凡是含有军事目的的政治、外交、经济、舆论、科技、间谍、情报等行动，都是受军事战略思想所支配的行动。千万不要认为军事战略思想只支配军队的行为。我们千万要记住：“不战而屈人之兵”，乃“谋攻”之“上”策。战争的发展愈来愈显示，战争的指导者正愈来愈多地把真正的军事武装行动用伪装的其他行动表现出来，“9·11”袭击就是其例。且不说那些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做的除军事威慑以外的种种努力。有时看上去似乎与“战争”没有多大关系的思想决策，却往往是重要的战略思想，甚至是“釜底抽薪”式的可导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战略思想。

所以“上兵伐谋”是一切战争指导者所应遵循的战争指导原则。它不是否定军队，否定诉诸武力，而是强调要有高层次、高境界的用兵谋略。世界上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都能遵循孙子的“上兵伐谋”思想，人类诉诸武力的战争将会大大地减少，人类的生命和物质文化将会得到应有的广泛尊重，人类的文明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上兵伐谋”思想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兵”，是否只要是诉诸兵刃了，就不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了呢？非也！战争，是敌对双方的较量，一方用尽办法，一方非战不可，最后还是要诉诸武力。但只要是遵循了“上兵”的谋略原则，依然是最高明的“善者”。以“上兵”做战略指导进行的战争与一味只知使用武力所进行的战争，其代价和结果是绝对不会一样的。

战争、军事始终由政治集团、政权根据其需要来实施。所以军事思想史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军事著作所反映的思想史，也不仅仅是军事将领、军事家的军事思想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史，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集团运用军事为中心的种种手段来夺取、建立、巩固政权的思想决策的发展史，这是实际推动历史进程的军事思想。军事著作所反映的是军事学术发展史，每部著作都是对当时和历史上特定战争经验的总结，是为一定的政治集团的军事斗争服务的，如果这个作者本身是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指挥战争的，那么，其思想基本上是现实的战争指导思想；其余著作，则是军事学术研究者的思想，是为当前和今后的军事斗争研究者和军事学术研究者学习参考的。而军事将领的军事思想主要是执行或参谋政治集团的战争决策的思想，其中不乏独创性，但反映的都是当时军事思想的局部，而且多是战役和战术方面的。真正导演一定时期战争活剧的是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这才是实际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军事思想，这才是军事思想发展的主干。

军事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否则，充其量只是政治家、政治

集团指挥下的一介武夫，可以称为将领，但不是军事家。

华夏民族军事思想发展至今，与国家政权形态和军权掌控机制相适应，军事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联合军权时期，专制军权时期，政党军权时期**（该时期的内容不在本书范围内）。

联合军权时期（从夏启至春秋战国）

华夏民族最初的“国家”脱胎于氏族联盟，是各尊贵氏族对被灭了族姓的奴隶的联合统治，只是王族居统治阶级各氏族的最上层而已。“天下”是王族联合各有关氏族打下来的，各尊贵氏族（贵族）也就有自己招之即来的军队。名义上，军队都属天子指挥，但人、财、物和训练都是各族自己的，所以其军权从本质上来讲，是联合的。那一时期军事思想的重要任务是如何镇压氏族反叛和扩大征服范围，以维护在氏族废墟上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其军事制度、机构、军事训练是逐步的、缓慢地完备起来的。如果某一尊贵氏族的人望和军事实力可与王族抗衡，王族就可能失去政权，夏商周的更替和夏朝中期的一度失政，就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就深深懂得：民心是政权无形的精神支柱，军事军队，是政权“有形”的“物质”支柱。光有军队而没有民心是不行的。

到西周时，军事制度、军事机构、军事训练才基本完善，情况有所改观。西周封邦建国的战略，打破了国家统治按氏族进行的机制，让王族子孙和其他贵族头领各领一个侯“国”，极大地有利于镇压殷商族的反叛，这种分邦而治之，共同拱卫周室的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各诸侯国的积极性，使西周很快地稳定下来并走向繁荣。“封建”制在国家体制上迈开了按行政区域统治的步伐，华夏历史上的行政区划由此萌芽。

由于各诸侯国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虽然编制是由天子给的，名义上是属天子指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军队的一切都是各诸侯国的，而且是具体的卿大夫的，所以军权的实质还是“联合”的。只是把大体横向的（尊贵氏族与王族）的联合变为隶属关系的纵向联合，之所以说它是“联合”的，是因为诸侯和卿大夫对其治下的军队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所以，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出现，社会关系大变动，从诸侯、卿大夫中走出了最初的新兴地主阶级分子，掌握了一定军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便以新的生产关系冲击着原来的生产关系，用新的战争思想作指导向奴隶主（封建领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王权衰落，诸侯纷争，战争频仍，天下大乱，思想阵地百家争鸣。出现了华夏民族军事思想大奠基时期，这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大转型的过渡时期，后来指导地主阶级专制军权的思想由此奠下理论基础。以孙武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家、政治家，正确把握了战争的本质特征，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战争的组织、指挥艺术，提出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原则，勾勒了以势取胜，“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崇高的指挥艺术境界，着力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把战争的指挥艺术推向“上战无与战”的境界。

联合军权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军权分散。夏商是各贵族与王族的联合军权，在西周，是各诸侯国军队联合受天子指挥的联合军权。联合军权是统治阶级掌握军权的最初形式，初级阶段。至春秋，联合军权，也就是军权分散的危害毕现。统治阶级深深感到了军权集中独揽的必要性。

专制军权时期（秦至明清 1840）

新兴地主阶级在其新的军事思想指导下，通过一系列革命性的战争，建立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的专制国家，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地主阶级的专制中央集权取代了奴隶制及西周的分封制，针对分封和军权的分散所带来的弊病，地主阶级将国家机器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被高度集中起来，最高统治者空前地加强了对权力、特别是军权的控制，全国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避免了因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分散而导致的战乱，加强了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和专制军权有一个致命的、无法克服的弱点，就是皇权的家天下一人世袭制将与地主阶级的长远政治利益产生必然的矛盾。家天下、世袭制是从奴隶社会继承下来的。为了保证家天下的传承，避免争夺皇权的战争，地主阶级不得不首先排除了皇族以外的人继位的可能性，其次是排除了皇族宗室成员非皇命而继位的可能性。这一制度，这一军事战略思想，不但要以牺牲地主阶级非皇族人的政治权利为代价，还要以牺牲皇族宗室人的权利为代价。最严重时，皇族宗室成员被限制得形如囚徒。社会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决定了皇帝所总揽的全国军政事务的极端重大，地主阶级的长远政治利益需要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来担当皇帝。可是，在世袭制下，在狭小的血缘圈子里选定的皇位继任人，则不能保证继任者都有政治家资质，不能保证他能担当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有时还要出现血缘上“后继无人”的情况，这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哀，是“国家”的不幸，特别是后继者无人的情况，更是对世袭制尖锐的讽刺。没有一个堪称其位的皇帝，就难以组成能代表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有效的朝廷，就不能保证政治的相对清明和社会的安定发展。而如果皇位继任者是幼儿，或痴呆等不堪其位的情况（这是经常会发生的），这时，太后称制、外戚权臣辅政专权，宦官专权等机制和现象便应运而生，军权的实际旁落、分散、转移就不可避免，军事政变、战乱和“禅让”接踵而来。地主阶级专制皇权时期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复杂的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斗争中，始终围绕着如何巩固或扩大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皇权，如何保证皇权的家天下继承，如何排除对皇权的各种“干扰”而不断绞尽脑汁，设下规矩和罗网。

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本书为古代部分，写至鸦片战争前。后面的情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商品生产的出现，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家天下专制政治的不合理性、反动性、丑恶性，愈来愈彰显，皇帝专制政治对社会发展的障碍愈来愈

大。民主意识首先在士人即知识分子阶层萌发。华夏民族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即已出现对家天下专制皇权严厉批判的思想家，只是由于满清的入主中原，把中华民族又拉回到奴隶制的边缘，使进步的生产力和思想家都遭扼杀，社会主要矛盾又回到同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斗争和反抗民族歧视上面去了。直到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才催生出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才出现洋务派、维新派、民主革命派。中华民族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阶级才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经过艰难复杂的政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民主制终于取代家天下世袭制，成为新的国家政体。中华民族进入政党主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当然地进入政党军权时期。

战争、军事，就是始终为着政权的不断的夺取、巩固、维护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而进行，尤其是在新的国家体制冲破旧的体制而产生、确立的时期，是军事斗争最激烈，军事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时是新的生产力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时期；是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化，阶级斗争异常紧张的时期；是旧的统治阶级无力控制，社会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是思想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是军事思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华夏民族在奴隶社会向地主阶级专制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在社会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制转型时期，产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的新兴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行民主革命的伟大军事理论。这都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会体制的新陈代谢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成果。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这种时代本质的剧烈变化之中才能产生具有历史丰碑性的伟大论著，因为只有这样的时期才有产生这种伟大理论的深厚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土壤。

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远不止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政体演变这一个方向，军事斗争也远不止这纵向的“内部”的斗争，他还同时伴随着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中的矛盾和斗争，这便产生横向的对外军事思想。在古代，相对周边来说，华夏民族是属于先进的民族，总的趋势是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向周边的辐射。但北方游牧民族曾经给华夏民族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中蒙元与满清入主中原，取代了中原政权，以正统中原政权自居。军事力量的强弱，战争的胜负，不一定与社会文明程度和生产力先进程度成正比，也不一定与军事力量的人数成正比，而永远与政治、民心成正比。当中原政权腐朽或内部分裂，而周边部族又有强有力的首领团结部族时，中原往往遭到侵犯或劫掠，侵入者往往取华夏政权而代之。但他们基本上都是落后的部族，其入主中原不能不把中原的社会拉向倒退——尽管他们自己是在前进。中国的地主阶级专制社会之所以很长，原因之一是历史的车轮多次被拉向后退，多次在奴隶制与封建制中徘徊，社会发展速度遭到严重阻滞。但这些部族入主中原后又不能不融入发展程度较高的地主阶级汉文化之中，使原附属于华夏政权的部族成为华夏民族光荣的正式成员。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华夏民族军事思想中另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时期华夏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纵横两方面的指导思想的交织下有机形成的。对外战略思想是对内战略思想的延伸，受对内战略思想的影响，许多政治代表人物、执政者往往是以如何对自身夺取或巩固政权有利来确定和调整其对外战略思

想。其根本目的仍在如何有利于夺取政权或巩固自身的政权。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压迫就有反抗。一个民族、国家的战争、军事还不止于上述情况，还有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造反战争和统治阶级的镇压战争。这种人民起义的军事思想和统治阶级镇压造反的军事思想，是上述“纵向”军事思想的一部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一部分。在华夏民族的发展史上，在有明确具体的历史记载的地主阶级专制时期，这种矛盾斗争在哪个朝代也未曾止息过（奴隶社会一样有，只是史料缺乏）。但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出现，没有新的阶级出现，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除了严重摧毁旧统治外，或失败，或建立同样性质的政权。只有在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出现，新的阶级产生的时期，才有可能由新的阶级领导而建立新的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但不管结果如何，被压迫阶级这种反抗的战争，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打通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是历史发展前进的伟大动力。许多时候，靠统治阶级的内部变法改制达不到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目的，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却可打通社会发展的障碍，开创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军事思想，如前所说，包括军事指导思想和军事学术思想。凡是政治军事集团作出的指导军事部署的思想是军事指导思想，而学者、军事人物总结战争经验、理论，为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一定战争服务的军事论著或言论的思想是军事学术思想。军事学术思想一定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集团、一定的战争服务的，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军事思想是不存在的。即使专门研究战争内部规律的著作，也必须是结合一定时期、一定作战对象、一定的阶级的战争观，为一定的战争指导者服务。军事学术思想总结了以前或当前的军事斗争及其理论，为当前的一定的政治军事集团服务，为以后的军事领导集团作参考。一般来说，军事决策集团的人，特别是其首脑人物，必须具备军事素养和研究军事思想，他们在此基础上联系军事斗争实践和其他学者、建言者的意见，产生出指导军事实践的思想，进行实际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指挥。其中的代表人物往往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一般学者和建言者的军事学术思想能否成为军事指导思想既取决于其科学性、现实针对性与可行性，又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集团——特别是首脑人物的认可程度。

战争，军事，作为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客观事物，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这便是武器的变化带来战术、战斗形态的变化；战术、战斗形态的逐步变化，又带来兵制、战略思想和战争观等整个军事思想系统的逐步变化。在武器装备没有根本性的革命变化之前，军事思想系统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反之，武器装备具有革命性变化以后，必然带来军事思想的革命性变化。它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造成社会的革命性变化的原理是一样的，而且是同步的。因为武器的变化正是生产力变化的成果，没有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就没有军事制造技术、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发展。所以，战争、军事、军事思想的内在发展与社会纵向发展必然是同步的，军事思想的发展本来就根源于社会的发展。

关于战争的决定因素，华夏民族战争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力、武器装备、兵员数

量，都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必要因素，舍此无法进行战争；但更具决定意义，更加必要的决定因素是政治、民心，是兵员的素质和战争指导者的运筹指挥，是“人”的因素。这是华夏民族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差不多都具有的看法。

一定的军事思想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派别，一定的政治集团的。一定的军事思想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土壤，它是一定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或论著作者审时度势的结果，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战略战术思想受一定的战争观的制约，为一定社会阶段上的各项客观条件所决定，尤其决定于战争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除受其战争观影响外，还决定于他们对军事理论的掌握程度，决定于他们对战争双方客观实际的了解程度，决定于他们运用军事理论于实际的创造性能力。

一个国家的安全，首先决定于“善政”，所谓“善政优于善战”、“良吏优于良将”^①是也；这丝毫没有贬低良将的意味，这是华夏民族极为珍贵的战争观。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吏治清明、政治清明，方能缓和矛盾，兴旺发达，众志成城。内忧既无，外患易御。任何政权内的“官员”或企业家、事业家，都必须有敏锐的政治军事头脑，都要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政权的安危。战争，是社会政治矛盾高度激化的产物，矛盾缓和了，内部战争自然就避免了。真正的善政者都会优先建设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保卫政权的、适应政治需要的、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世界是愈来愈“小”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愈来愈紧了。世界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任何国家、民族的和平、安全、发展，不能单方面地从自己立场上一相情愿地考虑，而必须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虑，必须首先谋求政治的全方位途径而不是仅仅是诉诸武力的途径来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问题与争端，必须从谋求世界的和平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和平发展与安宁。而这，恰恰是华夏民族军事思想所昭示的。但作为军队来讲，它的基本职能就是打仗，就是随时准备战争。人民军队就是要不断加强革命化、战斗化、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水平，时刻准备听从党和人民的命令，履行自己的神圣义务。军队不能有一天的“和平麻痹”的思想。因为，战争的危险并不因为我们战略上的和平努力而彻底消除。

中国，有着幅员广大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悠久的、不间断的文明史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的考验，中华民族军事思想的丰富，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军事思想在世界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对于我们认清世界大势，制定军事战略，遏制或打好战争，推动社会前进，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我们的军事家、政治家和一切爱国的人们，为了祖国的明天，都来关注军事思想，研究军事思想。

周亨祥

^①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叙寇原》卷一一。

目录

绪论

第一编 华夏民族军事理论的大奠基

第一章 华夏民族军事思想的早期形态	002
第一节 华夏民族战争的产生	002
第二节 夏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007
第三节 商汤的“革命”思想	009
第四节 西周的战略战术与战争法	012
第二章 华夏民族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第一座理论丰碑 ——《孙子兵法》	022
第一节 孙子兵法诞生的必然性	022
第二节 孙武其人	025
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	028
第三章 华夏民族军事理论基础的大拓展	041
第一节 孙臆对《孙子兵法》的拓展	043
第二节 与《孙子》并称的《吴子》	048
第三节 “兼爱”、“非攻”、重城守的墨翟与《墨子》	052
第四节 力主农战的商鞅与《商君书》	054
第五节 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韩非子》	056
第六节 关于军事法典《司马法》	058
第七节 “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尉繚子》	061
第八节 首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六韬》	065
第九节 其他诸子中的军事思想	067

第二编 华夏民族形成之际的军事思想

第四章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地主阶级中央军事集权政体的确立	078
第一节 秦统一六国的战略	078
第二节 秦始皇建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战略思想	082
第三节 被压迫阶级的第一声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85
第四节 楚汉战争中刘项战略思想的分野	089
第五节 西汉时期确立与巩固中央集权的严重思想斗争	095
第六节 秦汉的兵制思想	103
第七节 反映西汉政治军事斗争的《素书》、《三略》、《淮南子》 ...	106
第五章 华夏民族中央集权确立后内部大动荡时期的军事思想	113
第一节 刘秀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13
第二节 王符《潜夫论》的安边思想	120
第三节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大起义的军事思想	122
第四节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军事思想	125
第五节 力倡三分天下的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132
第六节 “保江东，观成败”的孙吴的战略思想	138

第三编 北方游牧民族扰乱中原、融入华夏民族时期的军事思想

第六章 民族冲突与融合中的华夏军事思想 ——魏晋南北朝军事思想	144
第一节 魏晋灭蜀平吴的战略战术	145
第二节 十六国形成的政治军事原因与战争思想	152
第三节 “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战略战术	164
第四节 寒微士族主政的南朝的军事特色	170
第五节 主动融入汉族的北魏拓跋氏的军事思想	175
第六节 宇文泰与府兵制	185

第四编 隋唐大气象中的军事思想

第七章 杨坚推进民族大统一的战略战术	192
第一节 隋文帝杨坚的战略战术	192
第二节 杨广夺位得逞与身死国灭的基本原因	196
第三节 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197
第八章 唐代军事思想的大变幻	199
第一节 李唐夺取政权的基本方略	199
第二节 玄武门之变的性质、意义	201
第三节 唐初的战略思想	203
第四节 武则天推进贞观之治的战略思想	206
第五节 安史之乱面面观	212
第六节 唐代中后期皇权沉沦的基本原因	215
第七节 隋唐兵制思想	218
第八节 隋唐兵学著作	222
第九节 黄巢大起义夺得政权与失去政权的基本原因	231
第十节 五代十国割据政权形成与存在的基本原因	234

第五编 第二次游牧民族侵入中原、融入大中华民族时期的军事思想

第九章 辽金西夏的基本战略战术	240
第一节 契丹崛起的基本条件与战略	240
第二节 辽军的基本战术	243
第三节 西夏政权形成与灭亡的基本原因	244
第四节 西夏的战略战术思想	246
第五节 螳螂捕蝉政治格局中金的基本战略走向	251
第十章 重文轻武的两宋军事思想	257
第一节 宋初的军事中央集权	258
第二节 由惧武轻文而重文轻武	260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中的军事改革	263
第四节 北宋政权灭亡的基本原因	266
第五节 南宋政权赖以成立的基本条件	268

第六节	南宋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思想斗争	269
第七节	南宋灭亡的基本原因	275
第八节	两宋农民战争的特点	276
第九节	宋代的军事学术思想	278
第十一章	崛起的蒙古兵学	288
第一节	蒙古民族的崛起与国家制度的建立	288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兵学思想	293
第三节	成吉思汗后，汗位、皇位争夺中的思想斗争	304
第四节	元朝的内外战略思想	309
第五节	蒙元兵制思想	315

第六编 华夏民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军事思想

第十二章	高度专制集权的明代军事思想	320
第一节	朱元璋反元建明的基本战略	320
第二节	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战略方针	329
第三节	燕王夺位与平定汉王的警示意义	337
第四节	地主阶级极端的专制制度，导致明朝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丧失 和倭寇的猖獗	340
第五节	戚继光的练兵、作战思想	343
第六节	明代繁荣的军事学术阵地	356
第七节	明代的兵制思想	378
第八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经验	380

第七编 满清入主中原初期的军事思想

第十三章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	388
第一节	努尔哈赤的战略战术	389
第二节	满清入主中原初期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思想及其变化	395
第三节	康、雍、乾的基本战略	401
第四节	八旗兵制思想	411

后记

第一编

华夏民族军事理论的大奠基

古代军事思想发展中

第一章 华夏民族军事思想的早期形态

第一节 华夏民族战争的产生

一、战争的产生

要论战争的产生，首先必须明确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什么？这似乎是个无须界定的问题。其实不然。我们通常所讲的、与和平相对的、与政治经济相提并论的军事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它应该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的斗争。

首先，战争必须是激烈的诉诸武力的斗争形式，非如此，不是战争；而且，它还必须是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不是个人行为。但仅有这两条，还不足以称为战争，因为土匪行为、宗族械斗、刑事性绑架斗殴，都不是战争。战争是政治行为，它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的斗争。所以，在武装的、有组织的、有政治目的的要素中，政治目的是最本质的要素。

因此，战争并非同人类与生俱来，而是社会进入阶级压迫阶段以后的产物。战争，也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孕育期，而且它的孕育期还相当长，人类社会的某个民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一切争、斗、战，都是战争的孕育形态，只有当这种争、斗、战是为着建立王权，为着建立阶级统治的“国家”时，战争才真正诞生。

我们讨论的是华夏民族战争的产生。华夏民族的战争也不例外，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战争孕育期。据考证，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远古时就活跃着中华民族的先民。150万～200万年前即有猿人生存，距今1万～2万年前，便开始了旧石器时代，并逐步完成了猿人—古人—新人的转变，从黑龙江到云南，从浙江到四川西藏，迄今已挖掘的三、四百处考古遗址说明了这一点。《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列子·汤问》：“长幼偕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以上种种传说，都是上古原始人群生活状况和进化过程的反映。

由于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类劳动所得的除保证氏族全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外，尚有盈余，这样，某些突出的个人及氏族首领就能获得较多的财产，私有财产